

国际关系理论

前沿

译丛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局部 自由主义、 全球化世界中的 权力与治理

〔美〕 罗伯特·O. 基欧汉 著

罗伯特·O. 基欧汉 门洪华 编

门洪华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000
F01
947

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 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

LIBERALISM, 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美〕罗伯特·O. 基欧汉 著

罗伯特·O. 基欧汉 门洪华 编

门洪华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SYAB90/0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美)基欧汉著;门洪华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5

(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

ISBN 7-301-07082-9

I. 局… II. ①基…②门… III. 国际政治—文集 IV. D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9967 号

书 名: 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

著作责任者: [美]罗·基欧汉著 罗·基欧汉, 门洪华编 门洪华译

责任编辑: 金娟萍

标准书号: ISBN 7-301-07082-9/D·086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 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7

排版者: 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82715400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12.375 印张 350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

定 价: 24.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教材供应部门联系。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

编辑委员会

主 编：赵宝煦教授，北京大学

副主编：秦亚青教授，外交学院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门洪华博士，中共中央党校

王 杰教授，北京大学

王逸舟教授，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王缉思教授，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

时殷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 编辑顾问委员会

主 任：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教授, 杜克大学
委 员(按英文姓氏笔画为序):

江忆恩(Iain A. Johnston)教授, 哈佛大学

彼得·J. 卡曾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教授, 康奈尔大学

斯蒂芬·D. 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教授, 斯坦福大学

海伦·V. 米尔纳(Helen V. Milner)教授, 哥伦比亚大学

凯瑟琳·辛金克(Kathryn Sikkink)教授, 明尼苏达大学

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教授, 哈佛大学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O.基欧汉教授过去20年撰写的主要论文的结集,是专为中国读者编辑的一本学术著作。收录了基欧汉教授1983年至2002年撰写并公开发表的10篇论文,以及2003年专门为本文集撰写的两篇文章,其中《多边合作的俱乐部模式与民主合法性问题》一文是由基欧汉教授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教授合写的。这些文章都是围绕世界政治的相互依赖、制度、全球化、治理等问题展开的,每篇文章都揭示了世界政治的一个层面,它们共同构成了理解世界政治的多个角度。本书的主题是,探究在相互依赖的情境之下国际制度如何运作。作者期望并相信,自己的学术研究能够引起中国学者的深入思考,对中国认识处于变化中的世界政治有所启迪。本书还附有门洪华博士的一篇论文,作为中国学者对国际制度理论及其应用的思考、对基欧汉学术研究的回应。

编者简介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 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 曾执教于斯坦福大学、布兰代斯大学、哈佛大学等, 曾任国际研究协会主席(1988—1989年)、美国政治学会主席(1999—2000年), 现杜克大学“詹姆斯·杜克讲席”教授, 著有《权力与相互依赖》(1977年、1989年、2001年, 合著)、《霸权之后》(1984年)、《国际制度与国家权力》(1989年)、《局部全球世界中的权力与治理》(2002年)等, 主编有重大影响的论文集多部, 是世界著名国际关系理论权威、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集大成者, 被誉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泰斗(Not a IR Theorist, but the IR Theorist)。



门洪华,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现供职于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清华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 重点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理论和大国国际战略。主要著作有《和平的纬度: 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专著)、《解读美国大战略》(浙江人民出版社, 联合主编)、《国际机制论》(新华出版社, 合著)、《权力与相互依赖》(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译著)、《国家实力评估: 资源、绩效、军事能力》(新华出版社, 译著)、《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 译著)、《探究世界秩序》(中央编译出版社, 译著)等, 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美国研究》、《战略与管理》等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数十篇。

总 序

在知识发展史上,任何学科都有着自己的知识谱系,任何知识谱系又有着连理贯通的思想和理论发展宏线。把握住这一宏线,就可以全面了解一个学科的知识谱系,便利知识的系统积累,推动知识的有意义创新。在学科的知识谱系之中,必有一些闪光的知识结晶,构成谱系的支柱。它们是原创性的学理思想,既能够启迪常规性的科学研究,又能够激发革命性的学理挑战。正是这些知识结晶的不断出现编织了学理思想运动的脉络,形成了知识生成发展的宏线。国际关系学也像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从上个世纪初成为一门学科以来,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知识谱系,显现出一条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宏线。仅从战后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简短历史中就可以发现,这一知识谱系的核心内容是冲突与合作,或曰战争与和平,发展宏线是从现实主义一统国际关系研究的天地逐渐发展为当今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足鼎立的局面。

也许是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血腥和冷战的恐怖给人们留下了太深刻、太沉重的印象,所以,战争与和平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永恒主题,成为无数国际关系学者毕其终生心血所奉献的事业。作为学者,他们探索冲突与合作的原因,揭示战争与和平的规律;作为人,他们希冀国际社会和国际社会中的成员能够减弱、克服和超越冲突,能够更加积极地合作,求得共同的安全和人的幸福。国际关系学的不同理论和学派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战争与和平的主题展开讨论和进行研究的,它们之间的争论也大多涉及合作与冲突的原因、内涵和意义。

政治现实主义主导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三十余年。从1948年摩根索的《国家间的政治:为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发表,到1979年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问世,现实主义一直是国际关系学界公认的理论范式。现实主义认为冲突是国际关系的根本特征,合作是有限的、脆弱的、不可靠的。无论是以摩根索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还是以华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都将冲突作为国家间关系的基本事实。

虽然摩根索将冲突归于人追逐权力的本性, 华尔兹将冲突归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 但由于人性和无政府性都是高度稳定的因素, 所以, 国际冲突从根本上是不可更变的。现实主义在 20 世纪 70 年代达到峰巅, 标志性著作就是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这部著作自 1979 年问世以来, 一直被尊为新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无论是对摩根索传统现实主义基本理念的发展还是其严谨的层次分析方法和高度简约的科学特征, 都被认为是达到了国际关系研究登峰造极的境界。尤其是华尔兹对国际体系无政府性的强调和对权力分配的关注, 为新现实主义构建了耀目的结构主义理论大厦。在战后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中产生了许多很有影响的著作, 如卡普兰(Morton Kaplan)的《国际政治中的系统与过程》(1957)、华尔兹的《人、国家与战争》(1959)、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的《界定国家利益》(1978)、奥根斯基(A. F. K. Organski)和库格勒(Jacek Kugler)的《战争的比价》(1980)、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1981)等等。虽然这些现实主义学者强调了国际无政府性的不可改变, 但是他们深思的问题, 或者说他们的理想, 是如何减弱国际无政府性和因之产生的冲突。他们认为, 达成和维持和平的关键因素是实力, 根本机制是大国间的实力分配和力量制衡。主张单极和平的霸权稳定说, 主张两极和平的恐怖均势说, 主张多极和平的势力均衡说, 无一不是将冲突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 把和平与国际权力分配联系在一起, 认为决定大国命运、决定世界命运的关键在于权力结构的天平呈现何种状态。同时, 从这些著作之中,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对修昔底德、马基雅弗利、霍布斯等西方思想家的继承和发展, 但是更加明显的是二战的遗产和冷战的烙印, 是对国际冲突的强意识和对实力的高度重视。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是战后国际关系学知识谱系中的重大结晶, 也成为战后国际关系思想发展宏线上的第一个里程碑。

在政治现实主义主导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三十余年之后, 新自由主义开始对其发起挑战。新自由主义认为冲突虽然是国际体系无政府性的产物, 但冲突是可以抑制的, 国际社会成员可以创造条件, 达成合作。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在美国霸权衰退的惊呼之中, 国际关系学者开始质疑物质性权力在维持世界稳定中的作用。虽然现实主义学者继续探讨什么样的权力结构格局最可能保持国际体系的稳定与世界的和平, 其他流派的学者却开始探索非物质性权力因素的作

用和意义。其中,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尤其突出,迅速形成了与现实主义两分天下的局面。1977年,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的《权力与相互依赖》问世,成为新自由主义重新崛起的宣言。随即,新自由主义学者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从不同于现实主义的视角审视国际关系中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基欧汉、拉格(John Ruggie)等人在理论层面上从国际规制(international regimes)的角度对新现实主义理念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1983年,国际关系学前沿杂志《国际组织》邀请新现实主义学者克拉斯纳主编对国际规制讨论的专辑,收入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学者对国际规制研究和争论的文章,承认了新自由主义的学术地位。同时,新自由主义在学理方面也迅速发展。1984年,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出版,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成熟,也引入了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全面论战时期。1986年,基欧汉主编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问世。这部著作是新兴理论对新现实主义的强有力的批判。它既收入了基欧汉和拉格等人从自由主义角度批判新现实主义的文章,也收入了比较激进的批判理论和后现代理论家对新现实主义的抨击。1988年,奈使用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标识,为两大学派定名。1993年,鲍德温(David Baldwin)编纂《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论文集,标志着现实主义一统国际关系研究天地的局面被彻底打破,新自由主义作为理论论战中的新兴力量迅速发展成为与现实主义势均力敌的理论体系。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十年,是新自由主义最为辉煌的十年。其间,新自由主义学者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包括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的《合作的进化》(1984)、奥伊(Kennith Oye)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1986)、斯坦(Arthur Stein)的《国家为什么合作》(1990)、拉格的《多边主义的重要意义》(1993)、巴赞和利特尔(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的《无政府状态的逻辑》(1993)等。如果说这些著作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可以具有同一个新自由主义学派标签的话,这个特点就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合作是可能的。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它们建立的国际制度的规约作用,都可以降低战争的危险,加强国家间的合作。至此,新自由主义形成了国际关系学知识谱系中的又一个结晶,成为战后国际关系思想发展宏线上的第二个里程碑。

从《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一版问世算起,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论战至今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在论战之中,新自由主义在国际关系学界的重要地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笔者认为,它在国际关系思想发展史上的作用 and 意义不仅是对新现实主义提出了严肃的挑战,而且还启迪和激发 20 世纪 90 年代跻身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行列的建构主义。虽然新自由主义承认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是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承认国际关系中冲突的不可避免性,虽然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体系是理性主义,但是,新自由主义对国际制度的强调无疑突破了物质权力这一现实主义的硬核,不仅将制度、规范这些属于社会范畴的非物质性内容引入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之中,并且使其成为最主要的理论概念和研究变量。1993 年,戈尔茨坦(Judith Goldstein)和基欧汉主编了国际关系理论论文集《观念与外交政策》,更是将观念作为与物质性变量并列的原因因素,用以解释国家的冲突与合作行为。这一重要过渡性著作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为建构主义的兴起作出了铺垫。

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 1992 年的论文《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被学术界公认为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宣言。建构主义认为,国际合作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国家可以造就一种从根本就趋于合作的国际政治文化。无政府性不是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因为无政府性本身也是国际社会成员在其相互的实践活动中建构起来的,它完全可以有多种逻辑内涵:既可以是敌对冲突,也可以是友好合作,根本取决于国际社会成员如何去建构它们之间的关系。所以,无政府状态是观念的体现,不是不可更变的客观事实。主体间的实践活动形成共有观念,共有观念形成了文化,文化决定了行为体的身份、利益和行为。以和平和友谊为基本特征的国际政治文化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国际社会成员的冲突行为。温特的论文激起了国际关系学界的激烈争论,又一次学理辩论爆发了。受到震撼和批判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重要学者都参加了论战。建构主义研究在论战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96 年,卡曾斯坦(Peter Katzenstein)主编了第一部重要的建构主义实证性研究论文集《国家安全的文化》,收入了他本人、温特和杰普森(Ronald Jepperson)对建构主义理论的阐述,也收入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费丽莫(Martha Finnemore)等建构主义学者的优秀实证性论文。

此后,费丽莫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1996)、凯克(Margaret Keck)和辛金克(Kathryn Sikkink)的《超越边界的行动者:世界政治中的倡议网络》(1998)、巴尼特(Michael Barnett)的《阿拉伯政治中的对话:区域秩序中的谈判》(1998)、韦尔兹(Jutta Weldes)的《建构国家利益:美国与在古巴的导弹》(1999)等属建构主义范畴的实证性研究专著也相继出版。1998年,《国际组织》在纪念创刊50周年的时候,专门邀请建构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三大学者卡曾斯坦、基欧汉和克拉斯纳共同主编了专辑,全面阐述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学理辩论,承认国际关系理论三足鼎立的局面。到1999年,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标志着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趋于成熟,一些学者开始将现在的国际关系研究称为“国际政治的社会学转向”。至此,建构主义成为西方国际关系学知识谱系中的又一思想结晶,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重要里程碑。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众多纷繁。在重大知识结晶周围既聚集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也吸引了包括非主流理论在内的其他学派的批评和抨击。但是,要把握国际关系学的基本脉络,首先需要了解的莫过于宏线之上的重大知识结晶。这是学科的核心,也是智慧的精华。了解这些知识结晶,我们不仅可以知晓大部分重要国际关系理论,还可以把握国际关系思想的发展走向。比如,从西方国际关系三大理论流派的论战与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国际合作越来越受到强调,行为体的社会属性和能动作用越来越得到重视,人文精神也越来越与科学意识融合在一起。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发展十分迅速。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国际关系已经被许多人称为“显学”。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许多西方国际关系学著作也被翻译过来。20世纪90年代初,由周纪荣先生主编的《国际政治学汉译名著》出版。这套翻译丛书贵在求精,尤其是收入了西方国际关系学的两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一部是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另一部是基欧汉和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迄今为止,这两部著作仍然是国际关系领域引用率最高的精品。这套译著的出版不仅引进了西方国际关系的理念和方法,而且也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科来说功不可没。十年之后,王逸舟先生主编了《国际关系学当代名

著译丛》，将西方国际关系的新视角、新理念介绍过来，其中既有反映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论战的重要著作和新现实主义学者的新作，也有建构主义的专著。这套译丛贵在出新，使我国国际关系学子又一次接触到新的观点和新的理论，成为他们重要的学术参考书。同时，中国学者进一步翻译介绍了西方的一些国际关系学著作，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作《霸权之后》和建构主义的理论代表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都反映了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最高学术水平。世界知识出版社等也在策划翻译和出版国际关系类著述。这些努力推动了我国国际关系学的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

我们的国际关系学毕竟还十分年轻，对西方国际关系著作的翻译也还是起步伊始，因此，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翻译缺乏体系，既没有充分注意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知识谱系，也未曾有意识跟踪国际关系学的思想发展宏线。比如，我们的翻译作品以西方现实主义著作居多，到目前为止，现实主义著作许多都被译为中文，有些名著，如摩根索的《国家间的政治》、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已有不同译本；有些虽然不完全属于学术著作但却包含强现实主义思想的宏论，如基辛格的《大外交》、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大失控与大混乱》等也迅速译出并相当畅销。这样很容易使国际关系的学生和读者形成一种失之偏颇的印象，即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就是政治现实主义。也难免使人们受到现实主义一家之言过于强烈的影响，将其视为惟一合理的国际关系理论。而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同样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却没有得到充分的译介，这些重要理论对国际关系的学理思维和对国际合作的积极认识也难以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有可能使国际关系的知识谱系无法得到完整的再现，使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的宏线在读者的认识和思考中出现断裂。进而，我们的译本多是根据译者自己的好恶作出的选择，这些译著之中不乏优秀作品，但散散点点，难以使读者进行系统的知识积累。并且，国际关系译著中既有学理性著作，也有政策性分析，更有对国际关系走势和天下事态的大论宏议。虽然满目尽好书，但却不能系统反映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学统主体、思想精髓和理论精华。

据此，北京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这套《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其宗旨是以西方国际关系知识谱系为蓝图、以主流理论发展宏线为基准，以学理思想为根本，聚焦西方国际关系思想交锋的前沿，重点

译介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优秀学术著作。

为了保证这一译丛的质量,北京大学出版社首次在国内国际关系学著作翻译领域使用了中外方编委会合作的方式。北京大学出版社特别邀请我国政治学界德高望重的赵宝煦教授担任中方编委会主编,编委会成员都是我国颇有影响的中青年国际关系学者,分别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是近十年内对我国国际关系学学科发展和学理研究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的学者。他们既亲身经历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又谙知西方国际关系学的脉络。他们的加盟保证了这套译丛的系统性、学术性和前沿性。同时,北京大学出版社还特意邀请美国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基欧汉为外方编辑顾问委员会主任,并由基欧汉教授本人邀请了六名国际关系学界一流教授出任外方编辑顾问委员会成员,他们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领衔学者,分别来自哈佛大学、杜克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和康奈尔大学。选定的每一本著作都是经过双方精心挑选和认真磋商之后确定的,尤其是基欧汉教授对每一本书精心推敲的负责精神,对保证译丛质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希望《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的出版会使读者对西方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体系有一个更加完整和系统的认识,为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人员提供新的视野和新的方法,使他们更加准确地把握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前沿理论和发展趋向。我们也希望这套译丛成为国际关系专业师生的教学参考书,以推动我国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当然,我们的最终目的还是希望这套译丛能够起到他山之攻玉的作用,使我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同仁通过借鉴、思考和批判,提出原创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建立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的中国学派。

是为序。

秦亚青

2002年9月8日于京西厂洼

罗伯特·O.基欧汉：诠释与发展 世界政治理论的经典大师 (代序言)

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历程可谓大师辈出、群星璀璨，而美国杜克大学“詹姆斯·杜克讲席”教授罗伯特·O.基欧汉(Robert Owen Keohane)无疑是当今如日中天的一位经典理论大师。如果我们不能将基欧汉视为国际关系理论奠基者的话，其作为继往开来者的地位却是毋庸置疑的。在其学术生涯中，基欧汉一直身处国际关系理论论战的核心，他提出了关于世界政治的松散模式，并通过对复合相互依赖、国际制度、全球治理等议题的研究，以国际机制(国际制度)为核心概念，逐步将其世界政治理论体系化，建构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纲领，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独立的国际制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不仅是架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学术桥梁，也时刻保持着开放的形态，借鉴和吸纳其他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特别是建构主义的最新成果，及时保持着学术前沿地位。基欧汉关于复合相互依赖、国际制度、全球治理等议题的研究成为带动国际关系理论整体创新的核心动力。概言之，作为诠释和发展世界政治理论的经典大师，基欧汉的学术高度值得我们潜心研究，其学术经历尤其值得我们深入挖掘，以从中寻求学术发展的启示。

基欧汉的学术经历

罗伯特·O.基欧汉，1941年10月3日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父母均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父亲罗伯特·E.基欧汉先后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和夏默学院(Shimer College)，“尽管未能成为知名学者，其思想却远远超出我后来认识的许

多学术领袖”^①。母亲玛丽·P·基欧汉是一位荷兰加尔文教牧师的女儿,从事中学教学和教师培训工作,一生致力于社会正义、公民权利与和平,晚年则成为活跃的环境保护主义者。父母对他的影响不仅在于学术道路的选择,更在于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剖析。

1957年,基欧汉进入父亲执教的夏默学院学习政治学。源于全家对哈佛的仰慕,1961年秋季,基欧汉成为哈佛大学政府系的研究生,师从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②接受父亲一生未能完成博士论文的教训,他成为“极其急切”的学生,拼命捕获知识。1965年,他用了四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完成了关于联合国大会政治——以联合国大会的制度框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联合国范畴内的国家间关系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并获得哈佛大学政府系1966年度最佳博士论文奖。

毕业之时,他接到了三个学校的邀请,哈佛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由于不喜欢哈佛大学当时的学术氛围和担心仍被哈佛教授视为学生而不是同事,基欧汉选择了斯沃斯莫尔学院。基欧汉不无幽默地指出,他选择到斯沃斯莫尔学院的原因是,更将自己视为与父亲一样的教书匠,而不是研究型学者。1965年,基欧汉开始执教于斯沃斯莫尔学院,与另一位国际关系理论执牛耳者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成为同事。

在哈佛读书期间,基欧汉就对处于国际关系理论主导地位的政治现实主义持批评态度,将博士论文选题确定为研究联合国大会政治的初衷也是要弄清楚联合国大会的制度环境是否对国家间关系有巨大影响;制度架构是否像权力、利益一样具有重要意义,还是权力和利益代表一切。基欧汉指出,自己对现实主义的质疑始于1964年,此前此后曾用了一年的时间拜会各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寻求联合国大会政治影响力的根源,对这一问题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尽管基欧汉当时尚未用明确的语言和社会科学理论来解释这一疑惑,但这一直是基欧汉几

①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 22.

② 基欧汉不无深情地回忆自己选择哈佛大学的原因:“在全家看来,芝加哥是一所大学,伯克利令人尊敬和喜爱,而哈佛却是不可企及的顶峰。我到哈佛读书完全是因为全家对这一名校的仰慕。”参见: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 23.

十年学术研究的主题。或许,基欧汉当时选择离开哈佛大学,是因为担心政府系浓重的政治现实主义气氛压抑其学术思想的开发吧。

1968—1969年,基欧汉成为位于华盛顿的对外关系委员会(The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的国际问题研究员,重点研究美国的一些小盟国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并曾在国务院副国务卿办公室工作过六周,这是基欧汉在政府工作的惟一经历。1968年,基欧汉与约瑟夫·奈(Joseph Nye, Jr.)等青年才俊被邀请担任《国际组织》杂志的编辑,成为其学术生涯的转折点,他从此进入了国际关系理论学术团体,并立志成为专注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基欧汉与约瑟夫·奈年龄相差5岁,“但学术旨趣却极为相同”^①。两人的合作始于1969年。1972年,在约瑟夫·奈的帮助下,基欧汉成为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研究员,两人的合作因同在哈佛大学变得更为紧密。两人联合主编的《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于当年出版,该书强调了跨国关系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性,成为两人牛刀小试之作。^②自此,基欧汉与约瑟夫·奈声名鹊起。

1973年,斯坦福大学邀请基欧汉指导一个新的本科生国际关系项目,并为其夫人南纳尔·基欧汉(Nannerl Overholser Keohane)提供了一个教授政治学理论的教职,基欧汉全家搬到斯坦福,基欧汉的学术发展就此起步。期间,基欧汉曾担任斯坦福大学政治系系主任,并被聘为正教授。由于长期担任《国际组织》杂志的编辑工作(1968—1977年、1982—1988年、1992—1997年、1998年至今担任编委,其中1974—1980年担任主编,1986—1987年担任编委会主席),基欧汉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有了比一般学者更为敏锐和深刻的把握。基欧汉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始于1970年开设多国公司课程,1973年开始与约瑟夫·奈合作撰写《权力与相互依赖》,由此大量阅读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著作。1977年,《权力与相互依赖》的出版使得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声名大噪。^③该书提出的复合相互依赖当时被视为堪与现实

①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 26.

②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eds.,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③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